



唐代文人文学 传播意识研究

Research on Literatus' Communication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黄俊杰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唐代文人文学 传播意识研究

Research on Literatus' Communication 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黄俊杰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文人文学传播意识研究/黄俊杰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307-20142-2

I.唐… II.黄… III.①古典文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国—唐代 ②文人—思想意识—研究—中国—唐代 IV.I20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5267 号

责任编辑:胡程立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30 字数:520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142-2 定价:9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ZW028)

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01221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

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传播意识和传播现象却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其后，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梁代皇侃释其义曰：“没世，谓身没以后也。身没而名誉不称扬，为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论语集解义疏》卷八）尽管对孔子这句话还可以有别的理解，但因早期注疏权威性的影响，遂使得古人大多遵从此解，并在留名青史一途孜孜以求。而要留名青史，除立德、立功外，对文人而言，便是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从事文章著述、创作，希望借此传播名声于后世。史学家司马迁曾明言要将《史记》“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少卿书》）；辞赋家扬雄也“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汉书·扬雄传》）；魏文帝曹丕更明确声扬：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这样一种对个人在后世名声的重视，经过代复一代的谈说和积淀，遂成为历代文人文学创作意识中不可忽视的一大要因，也作为一种对声名湮没的隐忧，内化到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去，并在隐显明暗的交叉中发挥作用。如果说，此一情形在文事渐兴的中古时期即已颇具普遍性，那么，到了诗文极盛的唐代，表现得便更加突出、强烈；如果说，在思想控制较为严格或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这种求名意识也许会因政治压抑、生命危机而转换方向，处于潜隐状态，那么，在诗酒风流、人性高扬而较少文字狱的唐代文人这里，便无遮无拦地表现出来。他们不仅在意后世名，更重视当世名；不仅多有特定的传播对象和读者群，在创作时即形成明确的针对性，而且还借助行卷、干谒、题壁、唱和、赠别、交游等各种行为方式而刻意求名，甚至利用自己营造的文学性事件，一日之间就暴得大名。因此，要了解唐人的诗文盛况，先须了解唐人的传播意识；只有了解了唐人的传播意识，才能对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的彬彬大盛获得更深入的认知。

黄俊杰君的《唐代文人文学传播意识研究》，就是这样一部全面考察

唐人传播意识的新著。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避开了前人多从传播现象着眼的路数,而将关注点集中在唐人的传播意识上,将传播现象与传播意识结合在一起,深入探究唐人的主体心性。在作者看来,文人文学传播意识的发生本原,在于文人冀求文章名世的愿望,以及对于湮没的隐忧所具有的内在逼迫力。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文章名世受到文人名声与品行的制约,并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念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文章名世的愿望可分为传之后世与传写四方的主观追求,其中传写四方的当时传播与传之后世的历史传播之间本具关联,不可割裂;而湮没的隐忧,作为一种心理因素的考虑,也支配着文人在文学方面可能具有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声名传播意识。

由此进一步,作者将文人的传播意识主要分为明道、存史、弘文、诉情四大类,依次进行考察。其间或考儒佛之争、文质之变、余暇为文及裨补教化,或述润色鸿业、实录贻鉴、入史意识及其对文史关系之认知,或析崇文局面之形成、复古新变与文人传播意识之关系、锐意文墨与热衷編集之风气,或论闲适余暇之娱情、悲愁忧思之感伤、隐逸遁世之心态,从而使得文人传播意识的显、隐、潜、无等状态得以彰显,也使得整个研究的核心部分翔实而丰满。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认为:意识作为意向性的体验,具有针对于对象的指向性;意向性涉及意义行为、意义内容和被意指对象。作者以此为理论依据,对涉及文人传播意识的意义行为,如类书编纂中诗文的加入,题壁、送别、行卷、诗文征求及文字饮等社会行为中的文学传播内涵,逐一进行考察;并对文人传播意识的主要意义内容、意指对象,即他们的审美性创作与实用性创作,以及文本的指向(读者)予以分析,认为在唐代文学极盛与文人文学传播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人的著述与社会行为均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诗、赋等审美性创作形式渐趋精丽工整,其题下小序与日益增多的苦吟行为的出现,则意味着文人对审美创作在传播方面的重视;书信、壁记、碑铭、判词等实用性创作形式,也都出现文学化的倾向。而当文本指向的对象即读者发生变化时,诗、文的风格也会发生若干改变。

在对唐人传播意识与创作新变予以重点论述后,作者掉转话头,从纵横两方面考察文人传播意识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动因。一方面,儒家传统的积淀,文学史的演进,乃是文人传播意识中存在明道、存史、弘文、诉情等因素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隋唐逐渐兴起的科举取士制度、雕版印刷对传抄的影响,以及佛教传布、文馆教坊驿站等方面的促发,也为文

人传播意识之强化提供了充备的条件。至于文人传播意识与文人的文学史地位,其间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关联。作者运用当前社会学中较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文人传播意识与文人的作品存世数量、唐代文人别集的存佚状况,以及作家传播意识强弱与其文学史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考察,认为文人的传播意识(场)可以决定作品的存世数量,却不能决定其文学史地位;决定一位作家地位的主要因素,说到底还是其作品的品质。而换一个角度看,作为传播意识量化反映的作品存世数量,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一位作家被阐释的空间;大量不同风格作品的呈现,也增加了他在后世被解读的维度。

通观黄著,选题新颖,论述细密,实具独到的感悟和创意。在研究中,作者始终注意突出唐五代文学传播的主体精神,以文人传播意识作为贯穿全文的主导线索,由此形成其独特的内在理路。研究运用了不少新材料,也善于从旧材料发现新问题,经过深入爬梳,清晰展现了中国文人对文章名世、文章不朽的理解过程。以文学传播意识的存在形态言,其所概括的明道、存史、弘文、诉情四种方式,既将文学传播与传统思想、历史观念、文风演化和文人情怀相融合,又突出了文学传播的指向和目标,可以说抓住了文学传播主体意识的关键。至于对传播意识中显、隐、潜、无几种状态的体味、思考,也别具胜意,补充了学界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书中有宏观的整体思考,也有微观的个案考索,后者以前者为旨归,前者则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二者相互结合,使得立论扎实稳健,亦具格局。譬如,将传播行为与著述活动联系起来,从中发现因传播需要而引起的文体变化,进而探求这些活动对书信、序文、判词、记体文、碑铭行状等实用性文体带来的影响,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推进。再如,通过作品数量、作品质量与文学传播意识、文学史地位等关联的对比,从文学史视角对文人传播意识与文人文学史地位的互相影响进行探讨;从留言、回复、纪事、标榜、传示、寄怀五个方面,对唐人题壁诗展开论证;从行卷所体现的文人传播意识着手,探讨其声名意识与传世观念,如此等等,均在前人已有较多成果的情况下,另辟蹊径,独标胜解。

这本书是俊杰君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记得在当年的答辩会上,评委们对该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若干存在问题和修改意见。对这些意见,俊杰非常认真地做了记录,在此后的几年中,进一步搜集材料,提炼观点,改订讹误,补所未备,使书稿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然,因时间、精力特别是认识水平所限,一部书稿要达到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俊杰也意识到了这

一点，所以在结语中坦陈，书中还存在对传播意识这一概念的定义有欠明确，对唐代文人传播意识较之前代文人有何发展变化、对后世文人有何启发影响等尚未做比较研究的问题，但我想，这并不影响全书的主干和核心观点，而且留下这些问题，正可以作为他继续深入思考，为下一部同类课题作准备的逻辑起点。

俊杰书即将交付出版，问序于余，义不当辞，遂匆匆写下以上感想，既将书的内容和特点向读者作一简要介绍，也希望俊杰能以此为基础，在学问之途上继续精进。

尚永亮

丁酉初冬于珞珈山麓

目 录

绪论：域外理论的借鉴与传统史料的整合	1
第一章 文学传播意识的内涵及其形成	11
第一节 文人与传播意识概念的界定	11
一、文人与闻人	11
二、意识与文学传播意识	26
第二节 名行之源：文人名世的思想根柢	39
一、“三不朽”在唐代的诠释与理解	40
二、乡邑之誉：文人名世的社会起点	68
第三节 文章名世观的演进路径与文人的存在思考	75
一、传之后世与传写四方：时间与空间的两种传播视角	75
二、道与文：立言不朽到文章不朽的内蕴嬗变	82
三、湮没的隐忧：文人关于自身存在的思考	86
第二章 文学传播意识的表征形态	99
第一节 明道：传统思想与文学传播意识	99
一、人文化成：裨补教化的明道意识	101
二、文章乃余事：明道意识下纯文学的地位	107
三、文质兼善的追求：六朝余绪之厘革	111
四、沙门与王者：儒佛之争与文以明道之关系	114
第二节 存史：历史观念与文学传播意识	121
一、润色鸿业：政治功能下的文学传播意识	125
二、实录：存史贻鉴的基础	130
三、《文苑传》与唐代文人的入史意识	135
四、文史异途与文史一体	142
第三节 弘文：属意词章与文学传播意识	145

一、崇文、新变与编集之风·····	145
二、文人的意气之争及其相关因素·····	163
三、唐代文人的文章不朽观念辨析·····	177
第四节 诉情：泄导情志与文学传播意识·····	180
一、娱情：聊以自适、雅集娱宾与感于斯文·····	181
二、感伤：悲愁忧思与文学传播意识·····	189
三、隐逸：遁世心态与文学传播意识·····	196
第五节 文学传播意识的显与隐·····	202
一、显意识·····	202
二、隐意识·····	204
三、潜意识·····	206
四、无意识·····	207
第三章 文学传播意识下的传播行为与著述活动·····	210
第一节 文学传播意识下的传播行为·····	210
一、类书编纂中诗文的加入·····	211
二、题壁诗的传播意向·····	219
三、送别中的赠诗文以宠行·····	233
四、行卷中的取悦主司与邀誉于时·····	234
五、由上而下的诗文征求·····	250
六、文字饮：酒筵上的浅斟低唱·····	253
第二节 文学传播意识下的文章创作·····	260
一、冀赏：意指对象与文学呈现·····	260
二、文学传播意识与审美性创作的心理驱动·····	271
三、文学传播意识下实用性创作形式的变异·····	281
第四章 文学传播意识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动因·····	312
第一节 儒学的深层影响与文学的现实发展·····	312
一、儒家传统与从希冀长生到文章不朽·····	313
二、文学的发展促成文学传播意识的深化·····	318
第二节 科举触动、佛教传布与雕版印书·····	325
一、科举制度对文人传播意识的触动·····	325
二、佛教传布对文学传播意识的启发·····	342
三、雕版印书带来的图籍变化·····	346

第三节 文馆、教坊、驿站与文学传播·····	351
一、文馆·····	352
二、教坊·····	362
三、馆驿·····	365
第五章 文学传播意识对文人文学史地位之影响·····	369
第一节 传播意识与作品存世数量之关系·····	369
一、唐代作家的作品存世数量·····	369
二、作品存世数量与传播意识的关系·····	372
第二节 唐代文人别集、总集存佚考录·····	374
一、别集存佚·····	375
二、总集存佚·····	427
第三节 传播意识的强弱与文学史呈现的效果·····	434
一、吉光片羽与传播无意识·····	435
二、有意识传播下的作品数量与文学史书写的空间·····	436
第四节 对亡阙与残篇诸现象的思考·····	438
一、唐人书目记有不记无·····	438
二、亡阙与残篇的主客观原因·····	440
结 语·····	442
主要参考文献·····	446
重要人名索引·····	456
后 记·····	465

绪论：域外理论的借鉴与传统史料的整合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予此潮流者，谓之予流。其未得予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取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确乎是学术的要义。发掘新材料，不仅有待于对敦煌、殷墟之类的出土文献的整理，而且有待于以新的理论视角从习见的典籍史料中发掘材料的新价值，来解决当今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新问题。这些新理论的产生，可以缘于思想家自身的构建，也可能来自域外思想的启迪。

传统中国学术历来不乏对域外理论学说的借鉴，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殷海光称之为濡化(acculturation)^②。远者如天竺佛教的传入所导致的东汉以来学术思想的突变，诞生了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思想的玄学；后来更在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对整个中唐以后的文人思想都有巨大影响的禅宗与理学。20世纪以来，借鉴西方文艺理论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工具更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趋向。晚清民初，王国维将西方悲剧理论融入中国古代文学的阐释与研究，陈寅恪借鉴西方的种族、文化学说对唐代政治史进行考证与诠释，学衡派因西方新人文主义的引进而诞生，皆为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此后，西方的美学、心理学、阐释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理论思潮如洪水一般涌入中国，对中国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1本，后收于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②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页。他所说的濡化实际包含双向的影响，主体文化所受的影响，他称为文化变迁。

的人文研究形成广泛的影响。近二十余年来有关接受美学的文学批评建立在“文本”“读者”这些研究对象上,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

以传播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一种新兴的理论视角。通过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状况进行考察,深入研究媚时、独立、传播、存世、湮没等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性情风骨,也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现实意义。

中国文学研究中引入“传播”这一概念是晚近发生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播学理论才逐渐传入中国。可是,传播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新事物,即便是作为该学科发源地的美国,它的兴起也不过才半个世纪的时间。1943年,以衣阿华大学教授 Wilbur Schramm(威尔伯·施拉姆)创办大众传播的博士课程为标志,传播学得以确立^①。传播学以人类的社会信息交流为其研究对象,它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立足点,重点的研究范围涉及传播的过程、手段、媒介,传播的速度、效度、目的等。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门学科的诞生也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可以说都与传播学相关。因此,传播学自产生以来,它自身不仅因为受到传统学科的影响而内涵不断丰富,还因为其理论上的某些特质,反过来对传统学科产生了影响,广泛地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一代之显学。

在近30年的时间里,传播学在中国的普及异常迅速。传播学的各种理论得到大量的翻译与介绍,传播学史上早期的奠基者如 Harold Dwight Lasswell(拉斯韦尔,1902—1980,提出5w模式)、Kurt Lewin(卢因,1890—1947,提出“把关人”的概念)、Carl Hovland(霍夫兰,1921—1961,将心理学方法引入传播学领域,主要从事劝服研究)、Paul F. Lazarsfeld(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意见领袖”概念的提出者)、Wilbur Schramm(施拉姆,1907—1988,早期传播学的集大成者,现代传播学的开创者)等人的理论逐渐被中国学界所了解。传播学的经典名著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念》《大众传播学》、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哈罗德·拉斯韦

^① [美]E. M. 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霍金斯的《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霍夫兰的《传播与说服》、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等也渐为国人所知。

如今，传播学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成为一种理论工具，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如火如荼。仅就中国知网所收录各类论著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播研究，其内容已经涉及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与作品。作品如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庄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文学、陶诗、《文选》，以及唐诗、宋词、明清的四大古典小说；作家如屈原、曹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均有较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对古代文学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途径的研究尤为繁夥，也体现出传播学理论重视传播过程、手段、媒介研究的独特性^①。

可是，在传播媒介并不发达的古代，尤其是在雕版印刷尚未普及的唐代，文人是否就已经具备了传播的观念，拥有了文学传播的自觉意识呢？^②如果有，它又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呢？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传播意识尚缺乏足够地关注，虽然也有研究者对唐代的白居易、明代的李东阳等人的传播意识有所探讨，对唐代诗文编集中所体现的传播观念有一定的论述，但总体上来说，仍没有系统、全面地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探索。

另外，中国的历史如此悠久，中国文学史的跨度又如此巨大，倘若不选取较典型的时段进行论述，必然因为材料的庞杂与文献的繁复而难以措手。正如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 1910—1989)曾说的，我们要是无法把可入选的领域减少到易于处理的范围，就根本不能希望揭示特殊的原因和结果^③。通过思考，我决定选取唐代作为本项研究的断代区间。其理由有四：(1)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为发达的一个时期之一，其间所产生的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之多，以及作品传播之广，均较为突出，极具研究价值；(2)对唐代文人文学传播意识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目前尚属空白，本书希望通过研究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3)唐代与稍后的

① 近3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情况可参见黄俊杰：《25年来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历程》，《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8~221页。

② 文学传播固然可以摆脱主体的观念而存在，但毕竟自觉传播与自发传播有着极大的不同。在考察文学传播之前，先对当时文人的传播意识有所考证，是合乎研究上的逻辑需要的。本书可以视为撰写唐五代文学传播史的理论准备。

③ [英] A. J. 艾耶尔著，李步楼、俞宣孟、苑利均等译：《二十世纪哲学》(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五代时期,政治上的盛衰治乱反差强烈,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文学传播意识的内涵变化较为深刻;(4)就文学传播史而言,唐代具有其他时期所没有的特殊性:其一,这个时代传播方式极其多样;其二,雕版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刊印本逐渐取代了手抄本的传播成为可能,文学的传播更加便利;其三,因为社会的开放、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交通的便利,各种文学传播现象也丰富多彩。

基于以上诸因素,本书将以唐代为中心,借助于相关的诗文资料与历史材料,对这个时期文人的文学传播意识进行研究分析,以为学界提供一条理解文学传播意识与文学传播现象之间关系的新途径。

二

文学传播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早已存在,并非在传播学理论产生以前就没有文学传播,如何细致、审慎地整理中国早期典籍中暗含的文学传播思想,需要研究者有渊博的学识与敏锐的眼光。譬如,孔子所说“杞宋无征”^①固然是关于文献传播重要性的认识,但“辞达而已矣”^②却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关于文学传播的认识与要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③,涉及文学的传播效能;唐代以来逐渐强调的“文以明道”的观念是关于古代文学传播目的的一个重要论述;中国古人对于史官、史书的重视涉及传世、传播的问题;文人们在文学形式上的追求不仅是文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与作品传播中受众的影响密切相关;等等。阐释这些思想与现象中所蕴含的传播学内涵,也是当前文学传播研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缘于当代西方传播学的兴起,它固然要借鉴西方,但又绝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其研究范围虽然也包括文籍的流传(借助于版本学的考察),但更重要的是要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当时的各种文学传播现象进行阐释。比如传播者的身份(史官、秘阁文馆学士、亲友、歌者)、传播的内容(当时文坛主流的创作倾向)、传播方

① 参见《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

② 参见《论语·卫灵公》篇,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9页。

③ 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5页下。)

式、受众情况、传播的环境(社会环境与具体场景)、传播的效果等。这些因素的差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传播效果,故不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作家影响的研究,作家的影响可能与传播的效果有一定关系,但二者不能等同。

文学传播研究正是要在一种社会学、历史学的眼光之下,展开从“文本诞生后”到“读者阅读、听到”这一过程的描述,并总结其间的模式、规律,以及这些传播规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一代之文学”。比如,通过考察各个时期文学传播内容的变化与一般文学史叙述倾向的区别,这样就会发现“存在即合理”有其史料上的欠缺与理论上的偏差;“存在即超越”虽然可以视作经典的代名,但仍需建立在文学传播的基础上。“湮没”的本质有时与未被传播密切相关,并非一定表现为不存在。文学经典的确立有其恒定的标准,但这个标准会随着不同时代的传播观念不断更新与扩容。所以,将文学传播史、接受史的书写,纳入与现有一般文学史的比较中来,从而完成对文学史的更加深入、全面的叙述,将是传播研究不能绕过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向,也是今后文学史书写中新的拓展领域。

考察文人的文学传播意识、文章传世观念是研究传播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考察需要结合传播背景来研究,包括社会思潮、政策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比如,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下文人的传世观念;复古与新变思潮下的唐代各期文学传播作品的差异;事功心态、科举制度对于唐人诗赋创作与传播的影响等。其他如对传播方式、传播区域的研究也蕴含了广泛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内容。所以,加强对传播意识与传播背景的考察,也将是文学传播研究中一个亟待强化的领域。同时,传播研究作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热点,还应该与经典研究、文学史研究、时间意识研究等热点结合起来思考,而不是孤立地加以考察,这样或许可以从理论上有新的突破。

文学传播的研究,实际是一种对文学史的重新解构。也就是说,要通过研究,能够做出一种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以文体或以重要作家为线索)的书写,要能够还原当时的传播史实,而不被后世的评论与各种主观的解读所左右。文学传播意识研究不仅要揭示其存在形态,还要揭示出它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并要考察这类意识的内在实质(如文章不朽、文章名世观念等),以及理解这些内在观念对于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在这样一种研究目的之下,确定文学传播意识的思想内涵与心理底线是根本,然后由此揭示这种思想根源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传播意识(形态),再对文人传播